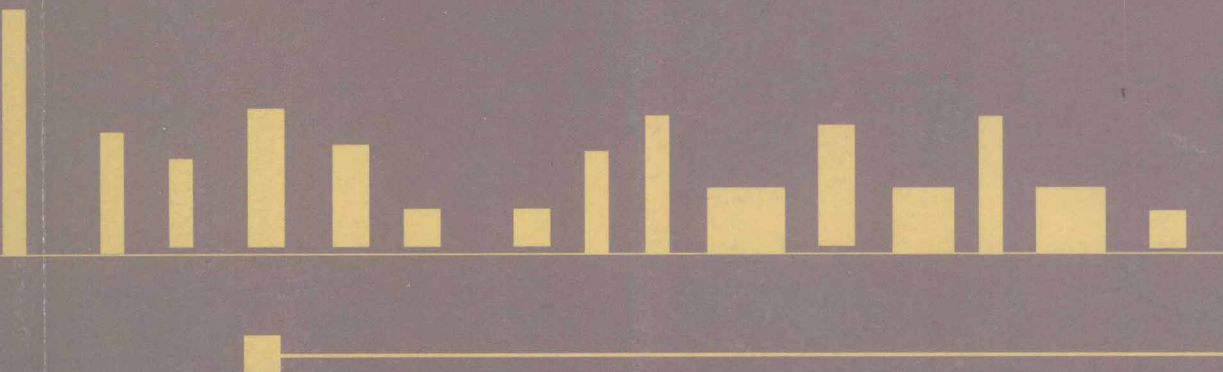


和聲
2010

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

■ 姚先国 廖可斌 主编





和聲
2010

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

■ 姚先国 廖可斌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声 2010：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姚先国，廖可斌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308-08101-6

I. ①和… II. ①姚… ②廖…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430 号

和声 2010：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

姚先国 廖可斌 主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92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01-6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引 言

2001年,香港著名金融家,原香港上海商会会长李和声先生,为了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慷慨捐资200万港元,成立浙江大学李和声经济与文化中心。中心由当时的经济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廖可斌教授担任理事长,由李咏吟担任中心执行主任,何春晖馆长与陈大柔教授担任副主任。

中心成立十年来,积极开展经济与文化研究,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论文,最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和荷兰莱顿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此同时,中心就杭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积极建言,提供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告,得到了市长的高度评价。此外,中心还专门成立了婉云京剧艺术社,由李小林老师担任社长,她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把京剧社搞得红红火火,在浙江大学极有影响,而且,她培养的京剧表演人才在全国大学生京剧表演竞赛中多次获得大奖。

为了展示中心成员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特别编辑了这本书。书名《和声2010: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表明这本书既是中心的学术成果的汇聚,又是对李和声先生的由衷感激。李先生和他的家族成员多次光临我们中心,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们给予的鼓励,正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应该承认,经济与文化,是现时代最重要的论题,由此延伸开去,可以获得无限丰富的自由想象。文集集中的论文,主要是浙江大学师生的成果,就这个广阔而自由的论题,论者从方方面面给予了讨论。这些文章,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自己的美好追求。从大处着眼,这些文章,就是对文明精神与信念的自由确证。美好的东西,必将传之久远,我们就是要追求自由与美好!

编 者

2010年7月于浙江大学李和声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引言	1
一 企业家与现代社会	1
利益关系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	3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3
关于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25
二 儒家思想的畅想	33
儒学的思想体系、根本特征与现代价值	35
今天我们应塑造怎样的民族文化性格	42
乐本与德音：从《乐记》看礼乐谐和的社会作用	47
三 戏剧与公民生活	61
野心/天意：从《麦克白》到《血手记》和《欲望城国》	63
权力/意志：俄狄浦斯家族悲剧的神秘性与现实性	81
四 文明与诗性体验	95
剑与十字架：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差异	97
论维柯《新科学》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	112
对话：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123
从有限到无限：存在体验的审美超越	134

五 诗歌与民族国家	151
惠特曼诗歌中“我”与“你”的对话功能	153
《伊斯兰起义》与雪莱的自由主义信念	165
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心灵拓展方式	179
六 地域文化发展战略	191
杭派文化战略构想	193
杭州丝绸文化与丝绸品牌的传播构建	214
七 艺术及其精神价值	245
现代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文学形象的创造	247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	266
八 美学与生活的意义	279
美是实在动心的有意义的张力形式	281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生活转向	286
美能否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生活的价值律法	298
后 记	311



.....

企业家与现代社会

.....

利益关系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

姚先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逾 30 年。2008 年对于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南方雪灾、汶川地震、拉萨骚乱、有毒奶粉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又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考验着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自洽运行机制。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国际经济金融动荡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中国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成为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评价

改革开放 30 年是中国经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从 1978 年至 2007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3645 亿元增加到 24661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增长率为 9.45%,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按世界银行汇率估算,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从 1978 年的十五位,上升到 2007 年的第四位,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PPP),则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总水平,也由 1978 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至 2007 年的第十五位。

丁学良教授把近 3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称为中国经济再崛起。因为直到 1870 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后来的一百年里,中国发展失常,大大落后于欧美。他援引国外学者的评论说,“1973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经济的 5%,而这 30 年的发展,中国迅速赶上来。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已占世界总数的将近 15%。”^①

从物质生产来看,2007 年中国已有 80 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有 958 种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居世界首位。排第 2 的德国为 815 种,第 3 位的美国 678 种。中国许多产品如彩电、电风扇、空调、照相机、缝纫机、微波炉、VCD 机、电话机、微

*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 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研究”(06JZD0014)的研究论文之一。



特电机、干电池、钟表、蚕丝、日用陶瓷、稀土材料、水泥、拖拉机、集装箱、自行车、摩托车、玩具、打火机等都占到世界总量的30%以上,有的高达70%—80%。

与此同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1990至2006年间中国公路里程从102.83万公里增加到345.70公里,增加2倍多。高速公路发展更快,从0.05万公里增加到4.53万公里,年均增长率高达32.5%;民航航线的里程从50.68万公里,提高到211.35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从16.64万公里上升到96.62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从1.59万公里增加到4.82万公里。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彻底改变了城乡面貌。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对外经济的迅速发展:197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455.6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300亿美元,其中出口211.7亿人民币,约合137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进出口总额猛增到21738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进口9558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2622亿美元。1979年引进外资几乎为零,而到了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为747.7亿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外汇储备金额达到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2008年进一步增加到1.95万亿美元。

一个逾十亿人口的大国,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连续保持30年近10%的高速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多次出现“经济奇迹”,如50年代的德国联邦、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四小龙”等,但就经济规模与增长持续时间而言,这些国家都不能与中国相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种转型同样在绝大多数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中发生,但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和破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萧条,甚至倒退。有的国家和地区(如南斯拉夫的某些共和国和自治省),至今还在动荡不安的泥潭中挣扎。与之相比,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感到骄傲和庆幸。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绩与人们的现实感受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反差。

国际上不断有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的。有不少人怀疑中国的统计数据高估,实际增长率没有统计显示的那么高。近几年这类质疑甚多,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同时对中国发展趋势的评价各异。“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交替出现,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特殊论”用以描述中国发展的困惑与路径。^①

从国内来看,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反而下降。中国社会调查所2008年1月23日公布对1000名市民的调查结果,在38项调查指标中,只有“对工作单位满意度”、“社会保险”和“地方自治”三项指标有所上升,而其他35项指标的满意度全部下降,其中反映幸福指数的物质生活水平满意度和精神生活满意度仅为38.1%和38.8%,而对于社会氛围的不满意度高达80%。与此形成

^① 洪朝辉:《中国特殊论》(The China Uniqueness), Cozy House Publisher, New York, 2004.

鲜明对比的是,调查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 13%,是进入新世纪后增长最快的一年! 2008 年重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件、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社会和谐与稳定受到极大挑战。有时一个偶发事件就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如瓮安事件、深圳事件等。社会上越来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理情绪,形成社会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国家进入到人均 GDP1000—2000 美元时,正是这个国家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似乎我国出现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是理所当然的“规律性现象”,对此我不敢苟同。放眼世界,固然可以找到人均 GDP1000—2000 美元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例证,但同时也可以列举出许多反证,瑞典、瑞士等许多国家在此期间就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面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既不能用“客观规律”的遁词自我麻醉,也不能用“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指责老百姓人心不古,而是要冷静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源与机理,寻找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根本之道。

二、增长主义的终结

之所以出现增长绩效与主观评价之间的反差,根源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生产扩张与生活改善之间的脱节。而这种状况正是由过去 30 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本身带来的。

改革开放 30 年的政策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对于经历过“文革”十年动荡,“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中国人民而言,这种政策导向无疑受到高度认同和衷心欢迎。发展生产力,全力以赴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举国一致的行动。市场导向的持续性改革措施,使得束缚生产力、阻碍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旧体制逐渐打破,企业和居民成为生产主体和市场主体,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市场化的“魔法”呼唤出被长期压抑的生产力,这是中国奇迹的谜底,也是中国的成功之道。

但是,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忽略了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尽管我国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早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目前,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累积的负效应日益显现,原有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矛盾:

1. 人与自然的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源约束日益显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中国是人口大国,2007 年人口总数达到 132129 万人,但多种资源极为贫乏,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资源瓶颈日益突出。



资源约束着重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土地不足。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只有 0.771 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106 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43%，而且耕地的质量不大好。近十几年来大量耕地用作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更加剧了人土矛盾。

二是原材料短缺。我国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原材料靠大量进口。近几年不断涨价，如铁矿石、铜材等都成倍涨价，加大了企业成本，而且还不能保证稳定供应。

三是能源产销缺口不断加大。中国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2006 年能源生产总量达到 221056 万吨标准煤，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位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中国能源消费量高居世界第二，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246270 万吨标准煤，仅次于美国。1991 年前中国是能源净出口国。自 1992 年起发生逆转，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2006 年进口能源高达 2.5 亿吨标准煤。

四是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污染状况十分严重，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城市的污染状况有所好转，但总体上依然严重，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到 2001 年底仅占 1/3。水体污染十分严重。85% 的河段不符合人类饮用水标准，而且河流自洁等生态功能也严重衰退，形势异常严峻。全国 669 座城市中有 400 多座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其中 110 座城市严重缺水。

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2006 年 9 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研究结果表明，2004 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118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3.05%。

2.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生产与消费有效衔接和良性循环，是经济平稳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市场均衡的基础。马克思早就深刻阐述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并据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根本冲突，导致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把这种周期性危机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国家调节来扩大支出，弥补缺口，以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而我们则自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计划管理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然而，客观现实并非如此简单。生产与消费的类似矛盾目前正在我们面前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断提高，但经济周期波动依然存在。1990 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标志着我国从短缺经济转为相对过剩经济。从此如何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供给大于需求成为一种常态，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现象屡屡发生，产能过剩、产品积压长期存在。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06 年已降至 36.2%。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 GDP 构成中的比例逐年上升，2006 年分别达到 40.8% 和 7.5%。与此相对应，GDP 各主要构成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

献率也发生变化。“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上升。2007 年分别达到 40.9% 和 16.2%。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来驱动的。而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总量中的比重高达 40% 以上,已超过了居民消费所占比重。

3. 国与国的矛盾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大量产品只能出口,由此造成中国外贸依存度提高,外贸依存度已从 1991 年的 33.17% 提高到 2006 年的 66.85%,其中出口依存度从 17.57% 提高到 36.8%。作为大国经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既增加了经济风险,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降低了外贸出口效率。中国贸易条件由 1983 年的 100 下降为 2006 年的 61.73,除 1983—1985 年、1988—1991 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外,其他时间段里,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李平、辛佳,2008)

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效益下降,净收益减少。低价竞争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法宝,许多出口产品利润极薄,主要靠出口退税维持。低价出口的实质是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宝贵的土地、环境、原材料资源做成廉价产品,满足国外居民的需要,提高了外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可是没人领情,相反却不断遭到国外的反倾销,甚至暴力抵制,如西班牙埃尔切的烧鞋事件。而辛辛苦苦赚得的外汇大部分存在美国,购买美国的低利率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又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相互攀比,采用低价土地甚至“零地价”,税收减免、税收返回、财政补贴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回报高,我国流出去的资本不仅大大超过外国投资,而且回报率极低,这就是所谓的“斯蒂格利茨怪圈”,即诺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描述的新兴市场国家以资金支援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中国可谓是这种怪圈的最大受损者。然而更荒唐的是,这种慷慨行为居然还被指责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关于中国对美国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说法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除此之外,中国出口剧增也带来了资源产品的进口增长,由此也引起很多国际摩擦。我们真诚地提出“和平崛起”、“构建和谐世界”的口号,可是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这种良好愿望能否变为现实尚不得而知。

无论对上述矛盾的解释有何不同,但至少说明,我国现行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这种不顾长远、不顾自然资源的约束,以增长本身作为目的、代价高昂的“增长主义”已走到尽头,必须改弦更张了。我国现在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模式、构造和谐社会正是基于这一客观要求。

三、利益失衡：和谐发展的根本障碍

构造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利益和谐。国内利益关系和谐是社会稳定繁荣的根

本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表面看似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代际利益均衡问题,不能为了这一代的发展而牺牲后代的利益。国与国关系的处理更是依赖于国内的稳定与和谐,一方面创新驱动、消费导向的科学发展道路有助于减轻对国外资源、技术、市场的依赖,从而减缓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以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要国内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又何惧外部压力与矛盾?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分享”,这是以人为本的完整表达。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此为基准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而利益关系失衡,发展成果未能由人民充分分享、合理分享,恰恰是我国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我国利益失衡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关系普遍、系统的失衡和扭曲。

1. 国家与人民的分配关系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经历了从下降再回归上升的过程。改革初期,国家“放权让利”赋予企业自主权,减轻税负,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最低时即上世纪 90 年代中降到了 10% 左右。随后不断有人呼吁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甚至提到了国家安全的角度,此后这两个比重就不断调整,逐步回升,到 2006 年已上升为 18.4%。从最近刚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①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呈现的基本格局是:财政收入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则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表 1 年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照(2004—2008)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a		税收收入 ^b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总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总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总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总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04	159878	10.1	25723	25.7	9422	7.7	2936	6.8
2005	183217	10.4	30867	20.0	10493	9.6	3255	6.2
2006	211924	11.6	37637	21.9	11759	10.4	3587	7.4
2007	257306	13.0	49449	31.4	13786	12.2	4140	9.5
2008	300670	9.0	57862	17.0	15781	8.4	4761	8.0
年均增长率	—	10.8	—	23.2	—	9.7	—	7.6

数据来源:《2008 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a) 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率都以当年价计算;b) 税收收入中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① 《人民日报》2009 年 2 月 27 日第 7 版。

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税负有增无减。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企业税负在 G8 和金砖四国中是最高的,世界排名更是在 181 个经济体中排到了 170 名。

表 2 各国税收比较(相对于利润)

国家	总税率(%) ^a	世界排名 ^b	国家	总税率(%)	世界排名
俄罗斯	48.7	123	印度	71.5	163
法国	65.4	160	中国	79.9	170
英国	35.3	59	巴西	69.4	162
美国	42.3	92	日本	55.4	142
德国	50.5	128	意大利	73.3	166
加拿大	45.4	105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Paying Taxes 2009: The Global Picture*, 2009。

注: a) 总税率是指由企业承担的全部税费总额除以企业商业利润。具体计算方法参见 World Bank, *Paying Taxes 2009: The Global Picture*, Appendix 1.4, 2007;

b) 分析单位是 181 个国家或地区,这里的国家是 G8 与金砖(BRIC)四国;数据来源 World Bank, *Paying Taxes 2009: The Global Picture*, 2007。

与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占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55.4% 下降到 2008 年的 43.3%;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从 1990 年的 30.9% 下降到 2008 年的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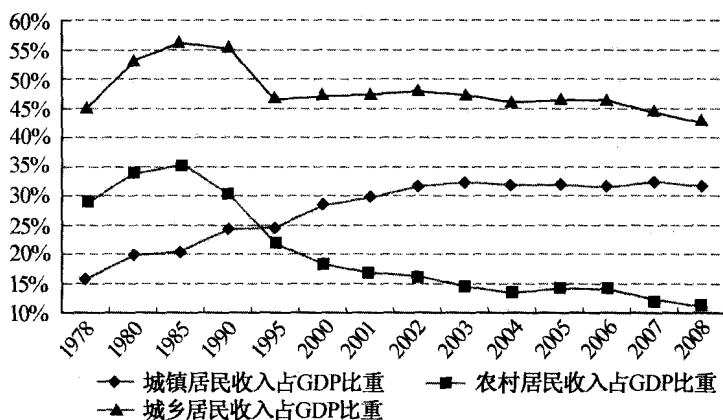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08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数据来源: 2008 年数据来自《2008 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7 年及以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8》。

注: 城镇居民收入 = 当年城镇人口数 × 当年城镇人口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计算方法类似; 城乡居民收入 = 城镇居民收入 + 农村居民收入。



2. 劳动分配率下降,劳资矛盾呈激化趋势。按收入法计算的 GDP,中国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从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存在着下降的趋势,这一比重从 1996 年的 53.4%,下降到 2006 年的 40.6%,下降了大约 13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劳资矛盾呈激化趋势,全国劳资争议案件从 1996 年的 48121 件,急剧上升到 2006 年的 317162 件,增长了近 7 倍。

3.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农民的相对收入地位下降。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城乡收入比从 1978 年的 2.57 下降到 1986 年的 1.86。但随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 2008 年城乡收入比高达 3.31,农民的相对收入地位不断下降。

4. 劳动者内部分配关系失衡,高端劳动者收入增长快,低端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据调查,广东东莞农民工十年间平均工资只增加了 60 元。2007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 1.4 万元,而平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年薪 6000 万元,相差 4286 倍。

5. 大中小企业竞争地位失衡,全国各地都扶优扶强,鼓励企业兼并和集中,在土地、资金、税收等各方面给大企业、外资企业优惠,中小企业竞争实力弱,再加上政策歧视,竞争不公平,生存条件恶劣。

6. 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7,如果加上城市居民得到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 0.5^①。中国已从平均主义走向贫富悬殊,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国家。

上述利益分配扭曲的格局,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导致社会不稳定,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现象出现,犯罪案件增加,因利益冲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发生,对社会和谐造成严重威胁;二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前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正是来自于这种利益格局。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利益调整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片面追求 GDP 的发展模式,已有许多批判和警示。党和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十一五”开始已采取切实措施推进经济转型,走自主创新、集约化经营之路,对环境、生态的保护力度加强,更加关注民生,着手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2008 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波及我国。从 2008 年 11 月以来,我国出口减少,增长率下降。不少工厂停产,导致两千万农民工失业回到农村。2009 年的就业形势、财政形势都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迈开的经济转型和

^① 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Vol44, No. 2, p. p. 111-120。

结构调整的步伐能否坚持走下去？这已成为考验党和国家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与十年前遭遇亚洲金融冲击相比，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有明显提高。应对危机的思路清晰，指导思想明确，采取的措施及时得力。十年前启动消费主要是作有钱人的文章，把储蓄从银行“挤”出来消费，而这次则同时强调要调整收入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推进医疗、社保等多项改革，以改善消费预期，促进消费。有些地方还发放消费券，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都是进步。

金融危机对中国主要的冲击在于外需减少，由出口下降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从增长角度看，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内需的增长抵消外需下降的不利影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

经济是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出口不足靠什么弥补，投资还是消费？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国投资比重已经接近 GDP 的一半，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重，再追加投资会进一步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消费比重太低，本来就要通过发展模式转变来提高。因此，从经济转型角度来看，显然应着重靠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

可是，增加消费必须增加普遍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收入，使其有能力消费。而目前的困难正在于，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外出打工，但经济不景气已造成两千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增加收入显然遭遇困难。

由此形成两难境地，经济转型和利益调整需要提高收入、促进消费，而目前的市场运行态势，却又不利于劳动者增加收入，甚至连工作岗位都难保。

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关键在于中央确定的四万亿投资如何使用。如果用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生产项目，虽然会有部分资金转化为劳动者和居民收入（按照经验数据约为 40%），但得益的主要是投资项目的承担者，由此可能造成社会的分配格局进一步恶化，贫富差别进一步加大。但如果把钱直接投于民生项目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保健这些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用于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产业部门，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则能使居民更多受益。在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创新能力的同时，改善其收入状况，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使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不能仅以促进增长为目标，促转型、保民生比增长更重要。考虑到用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对各级政府都是驾轻就熟，重走老路、重蹈覆辙并非是多虑的担心。

有鉴于此，当前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以富民为核心，以调节利益分配关系，转变发展模式为归宿，推出一整套社会政策，兼顾保增长、保民生的目标。最重要的有：

——改革税制，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扭转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倾斜的局面，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以保证民众的福利增长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